

多么精美的石刻！杨古城与徐钱湖向宋石马。(龚国荣 摄)



古城之子

——悼念杨古城先生

叶向群

1月13日上午9时许，接到朋友兼同事杨桂松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：父亲病危，留给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。

我问：血氧饱和度多少？目前身体状况怎样？

“血氧已降至70左右，人处于昏迷状态。”桂松语气平缓，感觉得出，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我惊愕半晌，实在想不出安慰的话，突然蹦出一句：握住他的手，给他力量、温暖！

当晚8时许，杨古城先生离世。自1月4日住进医院，到7日他就不会说话了，其间只是偶尔以点头来回答亲友们的问候。

杨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，朋友圈里满屏都是惋惜、追念，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。有人甚至发出感慨：头一天还阳光灿烂，13日突然凄风冷雨，老天爷分明也在同悲啊。我看着我不由苦笑起来：天若有情，这个冬天怎会忍心夺走这么多好人的生命？！

我与杨古城先生相识，已有三十四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谋职的报社副刊上开了个栏目，叫“宁波一绝”。某日，办公室来了位五十开外的高个先生，天庭饱满，五官俊朗，笑起来两眼弯弯，逗人的模样活像民间说书艺人。讲话声如洪钟，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，极具感染力。他先是旧时书生似地双手作揖，然后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收藏界的一则奇闻逸事：某乡间发现一件稀世珍品，犀牛角雕刻的高脚杯，而它竟被农妇放在鸡笼当作鸡食罐，又黑又脏。文保人员偶然发现了，奖农妇1200元人民币，农妇用那笔钱盖起了三间新屋。

听完这则堪称经典的“明珠投暗”故事，杨古城的大名就被我牢牢记住了。

此后，杨先生为“宁波一绝”源源不断地送来了此类“天方夜谭”。每次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先看故事，而后满心欢喜地编辑稿子。

与杨先生一同撰稿的是曹厚德。我与曹先生素未谋面，却心仪已久。老早就听说他塑过天童寺的菩萨，这就够厉害了，而他居然在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诗词等领域多有造诣。曹先生与杨先生，一个恂

儒雅，一个激情似火，性格迥异的两人却组成了最佳拍档。

2002年11月，杨老师亲自上门送了我一本他与曹先生合著的《四明寻踪》，因为收入这本文史散文集的多篇文章，率先刊发于“宁波一绝”栏目，他便嘱我写了一篇序。《大宝山下朱贵祠》《石漱遗迹王安石》《乌石岙中探古寺》《同翁寻访王应麟》……光看那些文章标题，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幅幅动人画面：一对老伙伴，拄着竹杖流连于荒山冷岙间，身上带了三件宝贝——一双登山鞋，一架老式照相机，一只装有指南针、卷尺、地图、纸笔的黑色帆布背包。一次次踏勘，一程程苦旅，从日出到黄昏，从春夏到秋冬。

退休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意味着含饴弄孙或蒔花弄草，而对于杨古城、曹厚德而言，意味着人生崭新一幕的开启。这一对步履矫健的“老年流浪汉”，自带干粮，奔走于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，在历史的陶罐瓦砾、老桥古宅、墓道荒草间，寻寻觅觅、量量丈丈；或者率领一支由摄影、民俗、历史、建筑专家以及文化热心者组成的庞大采风队伍，为钱湖石刻、镇海十七房、前童黄坛古宅、鄞州走马塘、月湖古湖心寺的命运，奔走呼号……

他们从来就不是游完一处风景吟哦出几行诗句的闲适文人，也不想成为一生捧着几卷古纸、几块瓦当，然后拿出放大镜琢磨个所以然来的学者，放达的脚步和不老的激情促使他们在踏勘中发现，在发现中考证，在考证中写出田野调查报告，试图招来更多关注的目光。距今800多年前的东钱湖南宋石刻、宁海前童那个几乎原封不动的明清风貌大村落、“瀑是龙化身”的海曙龙观五龙潭……一个个、一座座散落在乡野、惨遭遗弃、险被淹没的祖先遗迹，造化馈赠，经他们妙手一拭，展露出迷人面容，我们居住的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也由此平添几份厚重和光华。

我曾在一篇报道中，戏称杨古城、曹厚德为“文保狂人”，此后，这一称号似乎成为众所认可的“人设”，并由一串串数字得以验证：他俩考察过的古桥、建筑、石刻、寺庙、古村落、水利设施，数

以百计，几十年里考古照片拍了上万张，论文写了近百篇。光是黄坛、前童两个古村落，他俩前前后后就去了四五十次。为了保护祖先留下的遗存，杨古城、曹厚德和同道者一起，曾经秉笔直书，奔走呼号；曾经“弹眼落睛”，据理力争。他们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激荡起现实的回响：已被写上大红“拆”字的前童，现已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；张苍水故居、徐时栋故居，得以原地保护、修缮；散落在荒山野岙的南宋石刻群完好地重现东钱湖畔，填补了南宋中国墓道石刻的空白，今天的孩子又可以看到800多年前宋代文官武将的衣冠服饰、音容笑貌……

退休前，杨先生是宁波工艺美术所的高级工艺美术师，潜心研究，伏案写作，出版了多部艺术专著；退休后，本可以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度过时光，结果却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奔波、忙碌之路……而这一切，没有行政命令，自然也没有政府拨款，它完全基于自发。

我曾想，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种社会责任感。你也有理由将它提升到实现某种人生价值。但要是我说，那纯粹是在寻找一种稀人问津的晚年乐趣，你同意吗？

杨桂松告诉我，父亲7岁时随父母从舟山沈家门来到宁波，童年在三江口长大，一辈子讲一口“石骨铁硬”宁波话。父亲原名杨官诚，上世纪50年代，在当时的《宁波报》上发表一幅插图，随意取了个“古城”的笔名，没想到这个名字此后被一直沿用下来。

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杨古城此生要与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，结下解不开、扯不断的因缘。



世界各地的人文古迹，是杨古城的最爱。这些年在儿子杨桂松的陪同下，杨古城游览了柬埔寨的吴哥窟，越南古都顺化、岷港，缅甸古都曼德勒、佛教文化遗址蒲甘，位于印度尼西亚日惹的世界最大佛教古迹婆罗浮屠，泰国的大城，老挝占巴塞的瓦普庙和朗勃拉邦。图为2017年杨古城在缅甸蒲甘一座巨型石狮前留影。（杨桂松 供图）



刘文选《玉堂富贵》

宁波美术的拓荒者

楼世宇

刘文选先生走了，他的艺术人生定格在了一百岁，正好是古人所说的“期颐之年”。

“寿涉百龄”，算得上圆满了。其实在一段时间里，我都知道会有那么一天，但是，1月3日，当消息真的传来，内心还是不胜唏嘘与悲凉。

他是宁波美术当之无愧的拓荒者。从上世纪40年代国立艺专毕业分配到锦兴师范，再到后来筹建宁波师院夜大美术系，长期主持市美协工作，宁波美术从萌芽、生根、发展、壮大，到如今枝繁叶茂，刘文选先生穷尽了毕生心力。作为后辈，我有幸见证了他70岁后在创作和教育上的齐头并进，为所有从他身上得到的教诲而心怀感恩。

与刘文选先生相识，是1991年的春天。当时他正负责宁波师院夜大美术系的工作，学校需要外聘一位老师讲授中外美术史课程。经由宁波竹洲书画社周明增先生举荐，学校向浙江美院的钱景长先生发出邀请。那年我正在浙美读大四，刚刚完成毕业论文，钱景长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，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宁波，我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抵达宁波那天，已是下午。周明增先生陪我们去了宁波师院夜大。当时夜大成立不久，还没有自己的校舍，暂借位于广仁街的宁波八中作为教学与办公场地。刘文选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和钱先生一番寒暄下来，意犹未尽，便提出去他家用晚餐，继续畅聊。刘文选先生的家在横河街，紧邻夜大。那晚，刘师母做了一桌丰盛的宁波菜，席间的交流非常愉快，两位先生不时发出开怀的笑声。刘文选先生也问了我一些学习情况，还提起他的儿子刘翔和我同届，也在浙美就读。一番描述下来，我很快锁定：哎呀，这不是那个课余经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小伙嘛！我还暗想，回学校后一定要和刘翔同学好好说道这次“奇遇”。

几个月后，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宁波工作。一切安顿下来，我给刘文选先生打了个电话，他显得很高兴，对我说了一番

鼓励的话。

这以后，在宁波的一些美术展览上，我常常能见到刘文选先生的身影。他是市美协主席，少不了要为办展的画家站个台讲些话。看到我，便把我介绍给美术界的前辈和同道们，说这是美院史论系毕业的大学毕业生，以后谁需要写美术评论文章可以找他。

大概过了半年，某天，刘文选先生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宁波师院夜大缺少一位美术史教师，问我能不能去讲几堂课。当时的我正好有大把时间，加上夜大的课和我的工作并不冲突，就一口应承下来。后来，我便成了宁波师院夜大的外聘教师，一直持续了十几年。那些年里，我亲历了夜大的每一次搬迁，从宁波八中到三中、到李惠利中专的“寄人篱下”，再到先后有了位于育才路和环城北路

的独立校舍，名字也改成了如今的宁波大学成教学院，学校的规模和教育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。

2012年，我在东南商报文体部工作。时任总编辑王存政提议，是否在商报的“周日读本”中开辟一个“甬上名家”栏目，报道一批宁波的文艺大家。我和同事们很快做了策划，拟定了一系列采访对象，并定下首期推出刘文选先生的专访。

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初春午后，我和同事敲开了刘文选先生的家门。已近90高龄的刘老精神矍铄，谈兴甚浓。他把自己如何小小离家，从四川会理大山走出，翻过茫茫大雪山，到成都读私立中学，机缘巧合跟张大千学画一年，然后考入国立艺专，在抗战岁月中随艺专几经辗转，毕业后来到慈溪锦棠师范，从而走上半个世纪美术教育之路的历程娓娓道来，无数艰苦、惊险和欢欣的故事细节，听得我们如醉如痴。讲述过程中，他的乐观、豁达、举重若轻的人生态度，深深感染了我们。采访结束从他家出来时，已是晚霞满天。

如今，刘文选先生完成了他的百年旅程。这个岁末年初，文艺界走了多位名家大咖。我想刘文选先生应该不会寂寞，他在天堂也一定会安好，因为，那里一定有值得他拿起画笔的美丽的奇山异水、花鸟走兽。

鉴赏与收藏

风姿绰约 明净无尘

——启功笔下的朱竹

方向前

法上受元代李衍、明代夏昶、王绂等大师影响较大。与历代竹画大家相比，启功竹子里有一种恂恂儒雅的书卷气及恬淡从容的古典气息。“逸、清、简、净”是启功朱竹画所呈现的与众不同的审美意趣。

中国画强调精神气质，注重文人特性，追求书卷之气，中国画讲笔墨，更讲究画之品格。在现代画竹名家家中，个人认为吴湖帆与启功画的竹子格调最高，既秀又雅，抵达了“逸”的境界。启功笔墨功底深厚，人文修养极高，书如其人，画如其人，启功笔下的竹子，是画家的精神化身。正如元代倪雲林所说：“余之竹，聊以写胸中逸气耳，岂复较真似与非，叶之繁与疏，枝之斜与直哉！”也如清代画竹大家郑板桥在《墨竹图题诗》中曰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，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有人曾问启功为什么要画红竹，启功笑答：他不画黑画，只画红画。回答十分巧妙，似乎话里有话。

启功绘画，早年以山水居多，晚年开始涉足兰竹题材。他的朱竹作品，随性洒脱，风骨秀拔，显露出贵族皇家之逸气。启功的“竹法”与其书法风格极为相似，看似平正简单，但那种漂亮、干净、简洁的画法，极具辨识度。画理与书理相通，中国画的笔法、墨法皆自书法来。启功兰竹与其书法，形质相通，精神相融。中国文人画注重“以书入画”，启功的朱竹绘画，笔笔出自书法。启功书法线条瘦劲简洁，结体平正严谨，多留白，风格上典雅挺秀，美而不俗，这些书法特点在其朱竹绘画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和贯通。

红色，在中国色中最为热烈，象征着生命的热烈。朱竹的笔墨所点染的是中式美学的哲思与意趣。启功朱竹除了皇家富

贵之逸气外，另一个特点是“清气”。所谓“清”，是指清静秀润，清雅纯穆，骨气清新，清淡高洁。《杜鹃朱竹红欲醉》是启功与田世光、宋君方三人的合作画，启功画朱竹，田世光画两只小蜜蜂，宋君方（寿石工夫人）画杜鹃苍松。启功朱竹布置在画面的下方，竹枝依石而出，其叶挺立向上，竹在岩石旁顽强生长，富有生命力。作品中朱竹清简，枝叶间疏密、虚实、高低、浓淡参差错落，与作品上部的杜鹃、苍松形成了呼应，朱竹的红在作品中显得特别醒目和精神，一股清气扑面而来。

朱砂不同于墨汁，朱砂调得再稀薄，由于其颗粒状的特性，很难做到清透。朱砂的这一特点，容易导致画作凝滞而失去火气与俗气，或由于颜色过淡而失去鲜亮。但在《杜鹃朱竹红欲醉》中，启功先生凭借其娴熟的技法，深厚的学养，极高的艺术天分，所绘的朱竹骨气清雅，堪称作品“画龙点睛”之笔。

“简”是启功朱竹画的又一个特点。元代倪瓒在《云林画谱》中写道：“所谓疏者不厌其为疏，密者不厌其为密，浓者不厌其为浓，淡者不厌其为淡。”倪瓒绘画是文人画中“简”的典范，画面萧疏清淡，笔墨简净，达到“笔不周而意周”之境，与元王蒙“密者不厌其密”的画风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《崖间朱竹图》是1986年启功赠友人世奇先生的佳作，画家以“马一角、夏半边”的构图技巧，错落之朱竹悬挂于山崖间，竹叶向上挺立，亦有向下伸展，画家平时喜画山间野竹，与兰石、杂草结合，虚实相生，疏密相间，写出了竹子的品性。启功画竹往往只画竹之局部，随意挥写，亦竹亦草，以简代繁，留下大片空白让人遐想，其画作

“无画处皆成妙境”。

“坚净居”是启功的斋号，“净”者洁也。启功信佛，故启功书画作品自带“禅意”。禅宗美学的精神是看淡、看空世间万物，达到“物我两忘”之境界，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是“胸次洒脱，中无障碍，如水壺澄澈，水镜渊淳……落笔无尘俗之气。”弘仁、八大、石涛乃至弘一等大师的作品都有一种高不可攀的禅的灵魂，作品既静且净，空灵淡泊，明净无尘。读启功书画，让我深深领悟到潘天寿先生所说的“艺术的高下重在境界”。



▲启功、田世光、宋君方合作《杜鹃朱竹红欲醉》

◀启功《崖间朱竹图》



启功(1912-2005)，字元白，号苑北居士，北京人。当代著名书画家、国学大师，曾任中国书协主席、西泠印社社长。

启功先生以书法著称，不过他的绘画成就并不在书法之下。启老晚年喜画兰竹，他用朱砂描绘的竹子尤为珍稀，“朱竹世所稀，墨竹亦可有，随意笔纵横，人眼听我手”——诗中寄托了画家对朱竹的特殊感情。在艺术市场中，启功的朱竹作品比墨竹、翠竹等更受藏家的关注与喜爱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竹子与梅、兰、菊一起被称为“四君子”，又与梅、松合称“岁寒三友”，历来文人通过对竹子的赞美，来表达君子品性和独特的审美趣味。

朱竹的画法要追溯到宋代。据说苏轼年轻时对竹子情有独钟。一次聚会，大家约定每人画一幅竹以寄怀。大多数人按传统水墨画法来描绘竹子，唯独苏轼标新立异以朱砂画竹，且所画竹子无节。在场友不解，皆问苏轼：“你见过红色的竹子吗？”苏轼听后反问道：“你们都用墨来画竹，难道你们见过黑色的竹子？”大家顿时无言以对。苏轼开启了文人画朱竹的先河。

启功的朱竹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价值。他继承了苏轼绘画的文人性，画